

弗拉基米尔城主教谢拉皮昂其人其文和 13 世纪俄罗斯的灾难

左少兴

(北京大学, 北京 100871)

提 要: 布道文或“训诫文”是古代罗斯文学的体裁之一, 在文学史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当年传留下的布道文不多, 而谢拉皮昂的布道文是较好的: 它将爱国与爱教、卫国与卫教结合起来, 具有启迪并训导教民的政治意义和宗教意义。这篇布道文不仅影响当时的教民, 而且也影响后世, 特别是俄国宗教界。

关键词: 谢拉皮昂主教; 布道文 (“第三次讲道”); 13 世纪

中图分类号: I512

文献标识码: A

1 引言

一本介绍俄国文学与宗教的关系的书¹, 在谈及公元 13 世纪 30—40 年代蒙古鞑靼人侵占罗斯国土和随后的长期统治时, 特别谈到当时俄罗斯教会及其神职人士的“作为”和作用: “这时有些神职人员进行说教, 让罗斯人不要反抗异族侵略者。《符拉基米尔城主教谢拉皮昂的说教》(注: 即《……布道文》)是很典型的……”(该书第 71 页)。

为了了解这个所谓“典型”的真实情况, 弄清该主教有哪些“说教”, “说”了哪些“教”, 同时附带了解一下与此相关的其他问题; 不仅如此, 也为了探索、发现我国的“俄国文学史”著述中“缺失”了哪些古代俄罗斯文学的人文诉求和发展脉络及文化价值, 笔者查阅了不同时期的相关材料², 并在此基础上撰写此文, 藉以表明自己的一点初浅看法。

2 谢拉皮昂(?—1275 年)其人

在俄罗斯文学史中, 关于这位 13 世纪古代罗斯教会神职人士的“个人简历”的材料很少。谢拉皮昂(Серапион)是其教名, 俗名是什么——不得而知; 他的出生年月, 也不得而知, 只记载了他去世的年份——1275 年。

谢拉皮昂的宗教活动的记述也很简单, 有的“事”(如什么时候进修道院剃度成为修士等)也未提及。我们只知道他在 1274 年出任弗拉基米尔城主教(俄文用 Серапион, владимирский епископ 或 Серапион Владимирский 等; 顺便指出, 不要译成“谢拉皮昂·弗拉基米尔斯基”)之前是基辅洞窟修道院(Киево-Печерский монастырь 或“лавра”)的修士大司祭(архимандрит)。但是, 他何时从一名普通修士提升为“修士大司祭”, 任职时间多久, 我们也不甚了了。不过我们可以从他的一次关于“天灾人祸”的“讲道”中揣测到, 估计他可能在 13 世纪 30—40 年代进入基辅洞窟修道院成为修士。由于他长期在这个当时罗斯的宗教文化中心受到良好的教育和修行, 因而逐渐成为一位有学识和胆识的宗教文化人士。

他被誉为“经学方面的饱学修士”。

谢拉皮昂在基辅洞窟修道院任修士大司祭期间，与基辅都主教基里尔（митрополит Кирилл）的私交甚笃。1274年基里尔在东北罗斯的弗拉基米尔城召开并主持全国主教大会（此次会议议论了当时局势和定出了某些“规约”——本文下面谈及），都主教特别把谢拉皮昂带去参会，会上基里尔都主教举荐谢拉皮昂为弗拉基米尔城主教，但他任此主教时间很短（1274—1275年）。

19世纪俄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B.O. 克柳切夫斯基认为，“基辅在12世纪末就已经失掉作为罗斯国土中心的意义，在鞑靼入侵以后（指1240年基辅被侵占之后——笔者）则彻底没落了”（克柳切夫斯基 1992：333）。但是，基辅在当时仍是“全罗斯的都主教”的府邸所在地。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基辅都主教约瑟夫任职到1240年——正是蒙古鞑靼军侵占基辅等西南罗斯诸城之际，而过了3年，即于1243年基里尔才新任都主教一职。在基里尔任职基辅都主教期间（1243—1280年），他却很少时间待在基辅，更多的时间是在东北罗斯的（伏尔加河上游的政治中心）弗拉基米尔以及罗斯托夫、苏兹达尔等地度过，他的宗教活动也是在这些地方进行的。这里面表现出的俄国教会高层人士与入侵者蒙古鞑靼人的关系如何值得探讨。

正是“这时”，身为俄国教会重要神职人士的谢拉皮昂主教才秉承俄国教会的“卫国卫教”的传统，挺身而出，发表了一系列的布道讲话，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我们所译的所谓《谢拉皮昂主教的第三篇“布道文”》（我们在下面还要谈及并分析他的“布道文”）。由于材料的匮乏，某些问题我们仍不清楚，仍持疑问。例如，谢拉皮昂主教死后，是否被教会追谥为圣徒（святой）？在一本俄国出版的《正教词典》（《Православный словарь》，Ярослав Шипов 编，1998年出版）中的“名字和命名日”部分列出了365天（12个月每天）的男女名字，有时一天内有许多名字，一个名字在多日反复出现，以供父母为新生儿命名时选用。例如，Серрапион这个名字就出现了7次（仅9月就有两次：20日和26日）但与此相连的“日历中提到的圣徒名字”部分却没有Серрапион这个名字，何况俄国人中同名同姓者“多如牛毛”。由此可见，本文中的“谢拉皮昂”主教没有“封圣”。但令人不解的是，“古济本”中选编的《谢拉皮昂主教的第三篇布道文》（《Слово третье Серрапиона Владимирского》）这个标题下又用了另一个标题：《Слово святого преподобнаго Сирапиона》（《圣徒圣谢拉皮昂的说教》，第162页）。后一标题可能是它的较早版本所用。按基督教教会的传统，教会当局对那些立有功德的僧俗人士封圣（或追谥为圣）。谢拉皮昂如果真是“封圣”了，那么他的“说教”（布道文）则应更有分量了。

3 谢拉皮昂的布道文

3.1 布道文是古代罗斯文学的一种体裁

在俄罗斯编著的俄罗斯文学史中，那些含有基督教宗教教义教理的并在教堂等大庭广众中宣讲的文书，称之为“布道文学”（Проповедче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或简称“布道”（проповедь）。

我国学者编写的“俄国文学史”，由于受一些“语文的”和“非语文的”因素的影响，很少（或者根本没有）谈及像13世纪俄罗斯教会的“布道文”这样一个文类（或曰“体裁”）。我们以我国出版的、由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为主）编写的两部权威的“文学史”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这两部文学史是：曹靖华主编的《俄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李赋宁总主编的《欧洲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99年）。

《俄国文学史》中写道：“这两百多年（注：指1240—1480年）的异族统治（注：指蒙古鞑靼人统治）使俄罗斯的物质、精神文化的发展受到严重摧残。这一阶段留下的文学作品多为纪录著名战役的历史故事，如《拔都攻占梁赞的故事》、《亚历山大·涅夫斯基行传》……”

等”(第14页);《欧洲文学史》中的第三章第七节“中世纪俄罗斯文学”中执笔人写道:“在蒙古鞑靼军入侵和统治俄罗斯时期,俄罗斯军民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抗争……编年史中记载的战争故事更进一步同民间口头传说相融合,推进了战争故事文学体裁的发展,出现了一批具有民族史诗风格的中短篇叙事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是《拔都摧毁梁赞的故事》和《顿河彼岸之战》。”(第141页)。

由此可见,像蒙古鞑靼人入侵和统治时期出现的那些与“著名战役”或“战争故事”没有直接“联系”(或者没有直接描述)的作品,如布道文之类,在古代俄罗斯文学中,当然就难以占有“一席之地”。

但是我国著名的学者,英国文学史家、翻译家、评论家,北京大学教授杨周翰先生说得好:“……我们习惯于把有定型的文类(genre),称为文学,如小说、戏剧、诗歌……”,“保留……固定的文类不能包括一切文学,文学的概念不应过于狭隘,布道文如果确实能够在‘立意’上有所‘增华’,也应引进文学的园地。”³(杨周翰 1985: 111—112)杨先生同时引用昭明太子萧统在《昭明文选》序中给文学下的一个定义:“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接着他解释说:“‘踵其事’就是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增华’即贺拉斯的‘艺术’,‘变本加厉’也就是提炼、加强、提高。他(注:指萧统)提出‘增华’,‘加厉’,可见他注重的是文学所以为文学的特征……”(杨周翰 1985: 111—112)

上引两部文学史(以及我国其他高校编写的有关俄国文学史的教材)都提到一篇13世纪的文学作品——《拔都攻占(或摧毁)梁赞的故事》(«Повесть о разорении Рязани Батыем»)。

如果我们将这部作品与揭露13世纪蒙古鞑靼人攻占、摧毁从东北到西南绝大多数罗斯古城和大规模烧杀掳掠的暴行这些全国性灾难的“布道文”相比较,我们便可以看出,前者偏重于“故事性”,而后者则强调历史真实性。

苏联古济(Гудзий)院士写道:“谢拉皮昂的布道文情感充沛,语言形象有力,与当时苦难的社会现象有极真实的联系——所有这一切突显出这几篇布道文是当时的一个非同凡响的文学现象。”(Н.К. Гудзий 1953: 192—193)

3.2 谢拉皮昂主教的“布道文”的政治意义

杨周翰教授在《十七世纪英国文学》一书中谈到“邓约翰的布道文”时写道:“……中国历史上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佛教教义被儒家思想所吸收,而作为宗教,一般来说和政治斗争关系不密切。基督教则不然,尤其在17世纪英国,政治斗争往往通过宗教反映出来。人们礼拜日到教堂听布道,希望从中了解政治气候”;“人们听了布道还不够,还要读布道文”(杨周翰 1985: 113)。因为“……布道文不仅是拯救人类灵魂的工具;对当时的英国人来说,布道文是政治情报和政治看法的主要来源,在革命的英国,它对民众的意义是极为可观的”(杨周翰 1985: 114)。

把上面的话用来说明13世纪罗斯的政治形势、“政治气候”、广大教民的“苦难”和心态以及当时教会及其神职人士的作为,也是极为合适的。正如В.М. 伊斯特林院士所说,谢拉皮昂的说教与其说具有文学意义,不如说更具有政治意义。(В.М. Истрин 2003: 300)因此,我们就不能把谢拉皮昂的这类“布道文”单纯地看做说经讲道,而应将其看做通过宗教布道形式和道德说教而书写或宣讲出来的政治“檄文”。

《现代汉语词典》对“檄文”的解释是:“古代用于晓谕、征召、声讨等的文书,特指声讨敌人或叛逆的文书”(第1349页),即所谓“檄告天下”。但是,在我们所译的谢拉皮昂的“布道文”中,既没有晓谕“天下”举兵起事的呼吁,也没有鼓动教民“以暴易暴”的号召,更没有暗示人民“甘心俯首地去顺从屈服”外敌及其暴政。

像中世纪欧洲基督教的各国教会神职人士一样,弗拉基米尔城主教谢拉皮昂在布道过程

中，善于用经文、用真实历史事实、用鲜明生动的形象和热切的、“鼓动性”的煽情言辞去影响、开导、启迪、说服广大听众。从文章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效果来说，那些作为“消遣读物”的小说故事，与布道文不可同日而语。

3.3 谢拉皮昂的第三篇布道文分析

在具体谈及谢拉皮昂主教的“布道文”之前，我们有必要对一些相关“词语”作点分析介绍。

在苏俄时期出版的书籍中，在谈及类似“布道文”的宗教作品名称时，用词称名并不同一，而且多数名称是后世读者或研究者所取的。例如谢拉皮昂的布道文用“Слово”，用“Проповедь”（“讲道”，“说教”），用“Поучение”（“训诫”）等相称，正如伊斯特林院士所说：“从文学形式的方面来看，谢拉皮昂的《训诫》（«Поучения»）属于像《费奥多西的训诫》等这样一种类型。”（В.М. Истрин 2003：300）神职人士的讲经布道是先宣讲（произнести “说出”， прочесть “读”）后成文（написать “写”）。俄语词“Слово”是个多义词，其中有“说、言、讲、论、记”等意义。

至于13世纪古代罗斯教会人士的“布道”或“布道文”，它们总是结合“时局”，主题明确，引申经义，借题发挥；因此有学者将其归之于“政论文体”或者“演说体”等。特别在那“山河破碎”的时代，面向广大教民做“宣讲”时，布道人简直就是“音辞慷慨，声泪俱下”（引自《晋书·王彬传》）；我们甚至还可以想象，布道人有时可能（对一些令人发指的恶行等）会声色俱厉，慷慨陈词。从谢拉皮昂的“第三篇布道文”的行文用语、遣词造句来看，作者对整个国家面临的形势、社会状况、民心民风特别是那些王公贵族的所作所为等等，表现出怨愤之情：哀其不幸，怒其（对入侵者）不争和怒其内争（内斗、内讧——历史的积垢）。但从这篇布道文的行文用语来看，难以看出是“让罗斯人放弃与侵略者斗争，甘心俯首地去顺从屈服”。

让我们看看谢拉皮昂的“第三篇布道文”对入侵者蒙古鞑靼人带给罗斯人的灾祸说了些什么：“……这些异邦人异教徒对我们英俊美丽的男女青年、对我们年迈体衰的老人、对我们天真年幼的儿童，通通毫不留情”；“我们的村落十室九空，我们的良田杂草丛生，我们众多的子弟被掳走，成了阶下之囚，我们国家的尊严遭受侮辱，我们的大好河山沦落敌手，我们的财富成了他人的囊中物，我们的劳动果实被那些不信上帝的异教徒掠夺一空，我们的土地成了异族人的财产……”。所谓当时（如果说这个“当时”是指13世纪40—70年代，即谢拉皮昂“说教”时期）俄国教会“不想与蒙古人搞坏关系，以保证教会的利益和财产不受侵犯”等说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呢？在该布道文中写道：“……神圣的寺庙教堂被摧毁，圣物圣器被玷污，圣地圣殿被践踏；神职人士成了刀下之鬼，砧上之肉……”等等。这些对仇敌暴行的揭露之词，对广大教民听众来说，难道还不足以“振聋发聩”，让人猛醒吗？难道呼吁“以德报德，以怨报怨”的这个“布道文”不正是一种声讨蒙古鞑靼入侵者的“檄文”吗？这种“布道演说”，不正是在唤起民众、勿忘国耻国殇，牢记国破家亡的深仇大恨的强烈呼吁吗？这种“训（众）言”（поучение）不正是在警告训导广大教民（包括从王公贵族到平民百姓的所有罗斯人）要与入侵者誓不两立、抗争到底吗？人们不会忘记，在谢拉皮昂的这次布道之前不久，在1257—1259年，东北和西北罗斯的许多城镇（从诺夫哥罗德到弗拉基米尔等）的广大民众，纷纷举行武装“抗法”（即反对蒙古鞑靼汗推行的加强统治和剥削的“人口普查”政策）；而在他的布道之后，俄罗斯人也没有停止斗争，直到发展为1380年莫斯科大公国同蒙古金帐汗国之间的“库里科沃会战”和俄罗斯军队取得第一次有历史意义的胜利。

所谓谢拉皮昂在“布道文”中“企图说服人们相信，异族对罗斯的入侵是上帝对罗斯人所犯罪孽的惩罚”（见该书第71页）。其实，因为这些神职人士首先从宗教的角度来探寻和

解释灾难或不幸事件发生的“始因”。这是中世纪欧洲各国教会及其神职人员的一种“信念”，也是“说教”的要义之一。正如在这篇布道文中所写的，“我们惹起了我主上帝的万钧雷霆”，“我们遭到了报应”，“我主上帝终于让我们遭受凶恶残暴的异族人的入侵和欺凌”等等。这种“信念”基于他们秉承的基督教神学的核心“神意说”（即上帝的旨意）和源于基督教的“原罪说”这条教义。他们把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发生的种种“事件”——从天灾人祸、异族入侵、战争胜负、国家兴衰、改朝换代直到个人生老病死、吉凶祸福等等，都与“神意说”联系起来；而又由这“神意说”衍生出一系列与其相联系的神学“要义”：神恩、神助、神佑、神赋、神罚等等。此外，在本文引用 17 世纪初记述俄国动乱时期的天灾人祸的奥·巴里津的《在世的老辈人回忆的历史》中也谈到“神助”和“神罚”等问题（见本文“3.5 谢拉皮昂的布道文对后世俄国教会神职人士的影响”）。

基督教早期思想家、最著名的神学家、教父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圣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 354—430 年）著有两部表现自己的历史哲学和神学思想并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传世之作：《忏悔录》和《论上帝之城》。他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人的命运是决定于他自身，决定于他生命活动的道德意义，还是决定于上帝的旨意？”（A. 古谢伊诺夫等 1992：238）不仅如此，他还提出历史事件是由天意决定的历史观；在《论上帝之城》中他宣称，罗马城于公元 410 年被西哥特人占领，遭到严重破坏，这是罗马人的罪孽所造成的，罗马人原有的神灵未能拯救罗马城不遭灭亡，只有求助上帝，才能得救。与此同时，圣奥古斯丁又宣扬“原罪说”，声称人类因始祖亚当违背上帝的命令偷吃禁果而犯下的罪，传给后世子孙，绵延不绝，此乃“原罪”；因此人从一出生下来就带有这个“原罪”，而且人自身又没有能力去清除它们，只有信仰上帝才能得救。

在记述 13 世纪遭受“鞑靼之祸”，表现罗斯人沉痛的历史悲剧和民族灾难的书文中（以及其他世纪出自东正教会神职人士的书文中），我们经常读到“由于我们的罪孽”（за грехи наши）或“是我们罪有应得”（грехъ ради наших）这个词组，它成了俄语中的一个习用语。如在谢拉皮昂的“布道文”和《拔都攻占梁赞的故事》等作品中都有这个固定词组，如“И было всё то нам за грехи наши”（由于我们的罪孽才发生这一切灾难）；“... И течеше кровь христьянская, яко река сильная, грехъ ради наших”（基督教徒血流成河，是我们罪有应得）等。正因为如此，按基督教信仰的教义来说，人们要消灾弭祸，逢凶化吉，就“只有信仰上帝才能得救”，“只有求助上帝才能得救”。因此，那种所谓“……在面对蒙古鞑靼人的侵略如何找到解救的办法上，《符拉基米尔城的谢拉皮翁的演说》与《拔都攻占梁赞的故事》的观点迥然不同”（该书第 115 页）是言过其实的。我们认为，它们的“观点”没有什么不同，无论是“神助”还是“神罚”，都是“上帝的旨意”。难以想象，在面对强大的敌人时，《故事》的作者（据认为是几位僧侣先后补写成的）是“抗敌派”，而主教谢拉皮昂等人则是“妥协派”、“投降派”。事实上，弗拉基米尔大公雅罗斯拉夫已向金帐汗国“称臣纳贡”，于 1246 年从萨莱（被可汗召见后）回弗拉基米尔城的途中突然“中毒”而一命呜呼。而其子亚历山大·雅罗斯拉维奇（涅夫斯基）大公继位，也不过是金帐汗国的“藩属国”的统治者（左少兴 2004：63—75）而已。关于上述《……演说》和《……故事》之间的“观点”和“社会效果”的异同，值得我们另文（按我们自己的认识）加以评说。

3.4 谢拉皮昂的其他 4 篇布道文

俄国学者撰写的古代俄罗斯文学史，普遍都谈到 13 世纪谢拉皮昂的布道文，而且都认为，只有 5 篇传留下来。当然，作为当时著名的宗教教会神职人士（先为基辅洞窟修道院修士大司祭，后任弗拉基米尔城主教），几十年内不可能只有 5 次公开布道。我们凭传留下来的这 5 篇布道文，虽然只能大致了解到 13 世纪 30—70 年代全罗斯一般的政治社会状况以及内忧外患和天灾人祸的历史事件，但是，这些材料可以让我们后世读者的视野扩大开来，不再囿于一两篇讲述当时事件的故事（如《拔都攻占梁赞的故事》），也不再被一些“不实之词”

所误导。例如，我国的某本俄罗斯文学史中写道：“13世纪中期，铁木真（即成吉思汗）率领蒙古人的军队开始向俄罗斯大举进攻（笔者注：事实上成吉思汗于1227年就去世了），与此相关的历史事件在文学中得到了集中的反映。”这里，前一句不符合历史事实，而后一句则表明“与此相关的历史事件”，在谢拉皮昂的布道文中也“得到了反映”。

古济院士在其著作中还指出了《拔都攻占梁赞的故事》中某些有违历史事实的地方：“故事中不总是确切转述一些历史事实，例如，故事中谈到一些在保卫梁赞地区时似乎牺牲了的王公，其中一位（即普隆城弗谢沃洛德公）早在拔都侵犯之前很久就死了，而另一位王公（美男子奥列格公）在梁赞被摧毁之后过了许多年才死去……”；此外，“梁赞诸王公之间的关系，远非总是相互友好的……”（Н.К. Гудзий 1953: 181）

传留下的5篇谢拉皮昂“布道文”之所以有“第一”、“第二”……“第五”编号，是后人按他“布道”时间先后而定的。如前所述，实际上他有许多次布道，每次布道的时间间隔也有长有短，而第一篇“布道文”不可能是他第一次“布道”，第三篇“布道文”也决不是他第三次“布道”。俄罗斯文学的研究者们通常把“第一篇布道文”算在谢拉皮昂在基辅洞窟修道院任修士大司祭期间（早期）即30—40年代。理由是那个所谓“第一篇布道文”中谈到了1230年的基辅大地震，文中写道：“现在，我们亲眼见到了大地的震动”，从而说明此文是在大地震发生后不久写成的；但是，文中又谈到了蒙古鞑靼人对罗斯的侵犯和摧毁梁赞等许多城邑，这些事件的描述显然是在1237—1240年之后“补进”去的。而且谢拉皮昂把1230年基辅大地震这种自然现象（“天灾”）和1240年基辅的陷落，异族的入侵这些灾难（“人祸”）的发生，统统说成是“我主上帝对我们罪孽的惩罚”。这篇布道文的标题就是《论上帝的惩罚和战祸》（«О казняхъ божихъ и ратяхъ»）。

所谓“第二篇布道文”是谢拉皮昂于1274年初参加在弗拉基米尔城召开的全国主教大会和被基里尔都主教推荐为弗城主教后不久写成的。这也是从该大会（Собор）讨论“当时的形势”和一些相关的问题、作出的“规定”（被称为《（都主教）基里尔规约》«Правила(митрополита) Кирилла»）以及《第二篇布道文》的行文用语等而“推测”出来的。

在都主教基里尔《规约》的“引言”中问道：“我们的国土不是被人侵占了吗？我们的城邑不是被人占领了吗？我们那些有权势的王公不是也死于利剑之下吗？我们的子弟不是被人掳走了吗？我们神圣的教堂不是被人洗劫一空了吗？我们不是每日每时受到那些不信上帝的异教徒迫害和折磨吗？……”（В.М. Истрин 2003: 299）

在这次全国主教大会上还对这个《规约》做了一些补充，例如说：我们之所以遭受这一切苦难，是因为“我们没有遵守和坚持我们的圣徒和教父们制定的规约。”（В.М. Истрин 2003: 299）

谢拉皮昂主教的“第二篇”（甚至紧接着的“第三篇”）布道文就是根据会议的讨论和《（都主教）基里尔规约》而写成的。例如第二篇布道文中在引用“基里尔之问”（上面所写）后还加上“我们的父兄不是很快就阵亡而陈尸沙场吗？我们的妻儿子女不是被人掳走了吗？难道我们没有被那些异族人奴役而做牛做马吗？……”（В.В. Кусков 1998: 103）

上面引用的话又在谢拉皮昂的第三篇布道文中出现（参阅本文所附的译文《谢拉皮昂主教的第三篇布道文》）。

他的第四、第五两篇布道文的“内容”如何，与其前几篇布道文之间的关系如何，只能依据某些俄罗斯文学史研究者的简略说法。

例如，利哈乔夫主编的《11—17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中“弗拉基米尔城主教谢拉皮昂的作品”（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Серапиона Владимирского）一节的执笔人Л.А. 德米特里耶夫教授

写道：“谢拉皮昂的全部‘布道文’似乎是一个统一的系列，他怀着沉痛的心情描述了敌人入侵造成的灾难，并号召人们在面对严重危险时捐弃前嫌，不再内斗，摆脱自身的恶习和毛病。谢拉皮昂在几次‘布道’时谴责了那些彼此‘敌对’行为——他指的是王公们的内讧以及贪婪成性、对人民高利盘剥和种种恶劣行径”；“但谢拉皮昂的全部‘布道文’有一个共同的中心主题，就是蒙古鞑靼人的暴行……”（Д.С. Лихачёв 1985: 150）

短短一行文字连着用了“全部”、“共同”、“中心”这些字眼，而且都“落在”敌人的暴行上。但第四、第五两篇布道文的“中心主题”、作者的情感等等，是否与“第二、第三”两篇一脉相承呢？我们对此甚感困惑。例如俄国文学史家 В.В. 库斯科夫认为，“在谢拉皮昂的最后两篇布道文中，一些悲观主义的说法开始在逐渐消失，这证明了俄罗斯社会（包括教会各界）的普遍情绪的改变……”（В.В. Кусков 1998: 103）

我们难以理解：社会的普遍情绪究竟是如何改变的？是向着什么方向变化的？须知当时（1274—1275 年）还是蒙古鞑靼人征服俄罗斯不久并且是用铁与火建立“金帐汗国”统治的时期。

我们也不同意这样的说法：“《符拉基米尔城的谢拉皮翁的演说》里充满（着）怀疑、悲观、绝望……”（该书第 115 页）。所谓“一些悲观主义的说法开始在逐渐消失”（原文是“пессимистические рассуждения начинают постепенно исчезать”）。既然如此，是否说明“乐观主义的说法开始在逐渐出现和增加”？！不仅如此，我们读到并全文译出的《谢拉皮昂主教的第三篇布道文》中并没有流露出所谓“怀疑、悲观、绝望……”的情绪，更谈不上什么“充满”着这些情绪！

还是古济院士的说法比较具体和实际。他写道：“谢拉皮昂的第四篇和第五篇‘布道文’揭露了民间流行的极其粗野的迷信行为，……而且这些迷信在《基里尔的规约》中受到严厉谴责。谢拉皮昂专门抨击他的教区内根深蒂固的习俗，即用‘水火’等‘刑罚’来考验‘巫婆’，他还谴责把淹死的人从坟墓中扒出来的行径，似乎这些死人造成了农作物的歉收和恶劣的天气。谢拉皮昂在这些揭露中表明自己是一位主张人道、关爱人、有教养的人士，他以爱人、正义和健全理智的名义坚决反对狂热的宗教偏见。”（И.К. Гудзий 1953: 192）

对传留下来的五篇布道文作一总体分析可以看出，它们叙述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从天灾人祸、内忧外患到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等等；但抨击的主要对象仍然是入侵者蒙古鞑靼人。而作为坚守、捍卫、实践和宣扬宗教道德的教会上层人士，谢拉皮昂主教虽然也对一些王公和广大教民进行了“规劝”、教诲和开导，对他们中一些人的劣行、种种罪孽和社会恶俗进行了抨击，痛斥他们听不进逆耳忠言和某些人的冥顽不化。尽管某些教民罪孽甚多，一些王公的罪恶甚大，但谢拉皮昂在布道文中并没有指出或谴责其中某些人是“认贼作父”、“卖国求荣”，与入侵者“同恶相济”、“同流合污”等等。至于说什么谢拉皮昂主教把“我们的罪孽”斥责为“我们对上帝的不信仰”、“我们不信上帝”……这在古代罗斯信奉基督教已有 200 多年历史的情况下，让人难以设想；“我们”（古代罗斯人）竟然还“不信上帝”——这与那些“不信上帝的异教徒”又有何异！？须知，在基督教神职人士和广大教民看来“不信上帝”与“没有求告上帝”，“没有求助于上帝”，“没有向上帝祈祷”是不相同的，而“只有信仰上帝才能得救”与“没有信仰上帝而遭受灾祸”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表达的。

3.5 谢拉皮昂的布道文对后世俄国教会神职人士的影响

谢拉皮昂的布道文，特别是他揭露、控诉蒙古鞑靼人在古代罗斯造成的祸害和灾难的“第三篇布道文”，不仅在号召、鼓动当时罗斯社会各阶层奋起抗争起过直接的积极作用，而且对后世俄罗斯僧俗各界（特别是对俄国东正教会的许多神职人员）也有着深远的重要影响。

例如，17 世纪初年的俄国“动乱时期”（“Смутное время”），波兰—立陶宛军队入侵莫

斯科并扶植傀儡伪德米特里在莫斯科登上“王位”，同时给俄罗斯人民造成巨大的灾难。当时俄国教会一些有识之士通过各种形式号召人民起来与内外敌人（外国入侵者和本国的变节者）进行斗争，并且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率先抗击入侵之敌。当时最著名的修士、17 世纪初主管莫斯科著名修道院——有着“城堡—修道院”（“крепость-лавра”）美名的“圣三一谢尔吉修道院”（“Святая Троице-Сергиева лавра”）财务的奥·巴里津（А.Палицын），亲身参与并组织领导修道院“保卫战”。17 世纪 20 年代，巴里津以“口述历史”（讲“故事”，“Сказание”）的形式（即后来成书的所谓《在世的老辈人回忆的历史》，«История в память сущим предъидущим родом»），记述 17 世纪初年的“动乱时期”和外族入侵期间僧俗各界参与的圣三一谢尔吉修道院的“保卫战”等历史事件。

他在《……历史》中，与以往时代僧侣的布道文、“训诫词”等文书一样，也是以“За грехи наши”为“先行”语，接着把一切灾难和苦难看作是“上帝的惩罚”。例如在《历史》的最前几章中，巴里津写道：“……由于我们犯下许许多多、数不胜数的罪孽、无法无天的和非正义的行为而招致上帝大发雷霆”；“这一年（注：指 1601 年——3 年大灾荒的第一年）过去了，上帝对我们的正义惩罚仍在继续……第三年的情况仍然如此！啊，可怜啊！全国的黎民百姓在呻吟，在呼号……”（左少兴 2013：2、3、5）作者还进一步向俄罗斯人提出要求：“但愿人们知道整个俄罗斯因自己的罪孽而受到的神罚，知道俄罗斯为什么遭受异族人带来的苦难……”（左少兴 2013：2—5）“我们对敌人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敌人怎样对待我们，我们就怎样对待他们！”（左少兴 2013：2—5）

与此同时，一篇由佚名作者撰写的名为《哀悼无上崇高和无比光辉的莫斯科王国的沦陷和最终覆灭》（«Плачь о пленении и о конечном разорении превысокого и пресветлейшаго московска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一文中，作者哭诉了外敌占领并纵火焚毁莫斯科和斯摩棱斯克等城邑，莫斯科王国山河破碎，全国人民苦不堪言的悲惨情景。此文一开始就吁请：“我们恳求听众聆听我们的声音，请你们开动听觉灵敏的双耳，让我们张嘴吐出我们的心声……我们用充满悲伤的心在呼喊，我们用捶胸顿足来呼叫……”⁴“……任何一个正教徒眼见这样一个王国竟然遭此劫难并最终陷落，他怎么会不痛哭流涕？怎么会不嚎啕大哭？莫斯科，一个多年建成的雄伟美丽的城池，竟然毁于一旦！一场邪恶的大火竟然把她焚毁烧光！”“这样的惩罚，这场劫难，却偏偏落到了最崇高、最高尚的俄罗斯人的头上！”……（左少兴 2003：14，17）

此外，还有 17 世纪“动乱”年月和以后出现的一些“记述”文字。所有这些作品，也如同 13 世纪的谢拉皮昂的“布道文”一样，在揭露敌人暴行，哀悼国人不幸等方面，无一不是“字字血，声声泪”，读来令人唏嘘不已。

3.6 从谢拉皮昂的布道文来看俄罗斯教会与蒙古鞑靼人统治的关系

这是一个范围广、议题多、延续时间长的大问题。本文不拟过多述及。我们只想就某些令人不解的说法谈点初浅看法。

该书在两处有所论述：“从教会方面来看，教会不想与蒙古人搞坏关系，以保证教会的利益和财产不受侵犯……从蒙古方面看，入侵者也想利用俄国教会，把后者变成自己的同盟者以维护自己在俄国的统治，故给俄国教会以一定的特权。”（第 71 页）“（《拔都攻占梁赞的故事》）开篇就写道，拔都是异教徒，他不信上帝，而罗斯大公是热爱基督的虔诚的教徒。作品把拔都攻占梁赞，进攻……符拉基米尔等地并决心征服整个俄罗斯大地的侵略行为，归结为异教徒想根除罗斯人的基督教信仰，想把东正教从俄国大地上撵走……”（第 113 页）

从上面引用的文字来看，如果“罗斯人的基督教信仰”被“根除”了，如果“东正教（教会）从俄国大地上”被“撵走”了，入侵者怎样去“利用俄国教会”？利用哪个（原有的、还是“新建的”）教会？怎样把俄国教会“变成自己（注：也就是“异教徒”）的同盟者……”？

怎样把特权给“教会”？即使入侵者“给俄国教会以一定的特权”——人们仍会问：是在什么时间、什么条件下“给教会以一定的特权”？给了哪些特权？教会（以及它的教区）享受了哪些特权？是神圣的寺庙教堂“不得入内”？是圣物圣器“不可玷污”？是圣地圣殿“不得践踏”？是修士僧侣的生命财产“不受侵犯”？……？这种给俄罗斯教会的“优待”、“特权”与谢拉皮昂主教的布道文中揭露的蒙古鞑靼人（作为与基督教徒“誓不两立”的异教徒）在俄罗斯国土上的祸害与暴行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

从1240年基辅被攻占，或者从1244年（一说1242年）拔都汗“在窝勒伽河（今伏尔加河）下游撒莱（一译萨莱，今阿斯特拉罕）建帐，称钦察汗国（又称金帐汗国）”（《辞海·历史分册》1980：345）时算起，至1480年莫斯科公国完全摆脱金帐汗国的统治止，蒙古鞑靼人在俄罗斯国土上的统治历时约240年，时间跨度为3个世纪。金帐汗国的统治者在这两百多年内对俄罗斯实行的政策并不总是“始终一贯”的，也就是说，不同时间采取不同的政策。从初期的“铁与火”的攻占、征服，铁蹄所到之处烧杀掠夺，玉石俱焚的暴力政策，到随后时期的对罗斯各公国的王公贵族和广大僧俗民众整个社会和各地教会采取“两手”策略：一方面是镇压扫荡，另一方面是“分化”、“利用”、“拉拢”（或施以“恩惠”收买）等比较“缓和”的怀柔政策。俄罗斯的各公国（包括诺夫哥罗德等地）先后已向蒙古汗称臣纳贡，成了金帐汗国的藩属国，但金帐汗国的统治者也不时对俄罗斯某个公国或地区“异动”，如“闹事”、“反抗”等加以讨伐（包括像1380年的顿河“会战”）。与此同时，金帐汗又从自己的藩属国的王公中选择一位“合意的”，册封为“弗拉基米尔和全罗斯大公”（Великий князь Владимирский и всяя Руси），授权他代行金帐汗王对全罗斯的治理（在中国一些朝代中称为“儿皇帝”），实行“以夷治夷”的政策。而被“挑选出”的代理人如有二心，一经查出，则会面临“兔死狗烹”的命运。有时金帐汗国为推行自己的政策，当该政策（如1257—1258年推行“人口统计”法）受到俄罗斯许多城镇广大民众的“暴力抗法”时，金帐汗还授权并责成各地俄罗斯王公（其中有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用武力镇压。以上所说，大致就是蒙古鞑靼汗“宗主国”与俄罗斯“藩属国”的关系。

至于所谓“有些神职人员说教，让罗斯人不要反抗侵略者”（或者说占领者）这种“说教”是一贯的、经常的还是偶尔的？是只在某个（或某些）时期发表的？这种说法，与当时历史事实是否完全相符？这些问题都值得分析研究；这些说法是否有违俄罗斯东正教会及教徒们的“卫国即卫教”（反之亦然）的信念和传统？同样要分析研究。

我国著名宗教学家乐峰教授在《东正教史》一书中对此有些议论。他大致谈到了当时俄罗斯各公国的王公、贵族、领主的所作所为，受到“奴役”的俄罗斯居民的处境以及教会和主教们的活动。“总而言之，在蒙古鞑靼人统治期间，罗斯广大居民深受几重压迫和剥削，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一切统治者，不管他们是本地的，还是外来的，本质都一样……；而教会和主教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又需要统治者给予大力支持和扶植。……教会和主教们不但没有号召，动员居民奋起抵御外来侵略，反而跟征服者和平共处，同流合污，充当内奸，背叛人民，明里暗里帮助侵略者奴役罗斯……”（乐峰 2006：151—152）

这些对当时俄罗斯教会及其神职人士的指责——是不是有些“言重”了？！所谓“……1270年，蒙哥一帖木儿汗在致罗斯都主教的信中写道：‘教会的各种不动产——土地、水域、庄园、作坊、避暑和避暑的胜地——一概不得受侵占，教会免纳各种贡赋。’”（乐峰 2006：151）如果把这里引用的文字与同一时期（即13世纪70年代1274—1275年）俄罗斯全国主教会议的“议论”或都主教基里尔的言论（“规约”）和谢拉皮昂主教的“布道文”等作一比较，我们便可以看出，至少在某一时期内俄罗斯教会及其宗教神职人士是站在蒙古鞑靼统治者的对立面的。就在13世纪的1240年和1242年以及13世纪以前和以后，及至近现代，俄罗斯的军人和广大教民一直继承并发扬俄罗斯人民历来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传统。例如，1995年的俄国《正教教历》，在6月22日载有一篇纪念1941年6月21日“苏联卫国

战争”开始日的文章：《论保卫祖国》（«О защите Отечества»）。内中写道：“1917年二月事变之前，在俄罗斯，教会的概念和祖国的概念是不可分的。保卫祖国，也就是说，保卫教会，保卫父辈和祖辈的信仰，对每一位正教信徒来说，过去是今后也将是神圣的天职。无怪乎在第一批基督教圣徒中有不少的战士。你们还记得画家苏里科夫那幅著名的绘画《苏沃洛夫越过阿尔卑斯山》（«Переход Суворова через Альпы»），画面上亚历山大·苏沃洛夫那特别喜悦、明快、开朗的面容吗？著名的统帅是位虔诚信仰基督教的人。同样的情感也充满在圣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和圣季米特里·顿斯科依这些军人的心房中，因为信仰帮助他们保卫祖国不受侵略者的侵犯。俄罗斯教会及教会忠诚的子弟们多少次拯救了自己的国家——俄罗斯。”

我们的“附文”就以上面引用的“文字”（也可以看作俄罗斯正教教会的一个短短的“布道文”）作为结束语。

附文

谢拉皮昂主教的第三篇“布道文”⁵

左少兴 译

弟兄们，让我们来赞美我主上帝对人的爱吧！

我主上帝是怎样让我们对待自我的？我主上帝用了哪些言辞来教导我们？他用了哪些警醒的话来告诫我们？但是，我们却一点儿也听不进去。他见到我们日复一日地去干那些无法无度的事儿，见到我们不断地违背他的圣训圣言；我主上帝曾向我们显示一个接一个的神迹征兆，他使我们经历一个又一个的凶险厄难；他曾通过他的侍者来教训世人，但是，我们还是一句话也不听！

因此，我主上帝终于让我们遭受凶恶残暴的异族人的入侵和欺凌。这些异邦人异教徒，对我们英俊美丽的男女青年，对我们年迈体衰的老人，对我们天真年幼的儿童，通通毫不留情！

我们惹起了我主上帝的万钧雷霆。用《圣经》大卫“诗篇”的话说，上帝对世人的愤怒很快就有结果了：神圣的寺庙教堂被摧毁，圣物圣器被玷污，圣地圣殿被践踏；神职人士成了刀下之鬼，砧上之肉；我们王公的军队被杀得溃不成军，精兵强将竟然销声匿迹，那些勇夫猛士竟然充满恐惧，临阵时竟然逃之夭夭；我们的村落十室九空，我们的良田杂草丛生；我们众多的子弟被掳走，成了阶下之囚；我们国家的尊严遭受侮辱，我们的大好河山沦落敌手；我们的财富成了他人的囊中物，我们的劳动果实被那些不信上帝的异教徒掠夺一空；我们的土地成了异族人的财产；我们罗斯人成了我国四邻的笑柄，我们国家被昔日的宿敌当成笑料！

我们遭到了报应！我主上帝的愤怒像晴天霹雳一样炸开了，像倾盆大雨一样自天而降。上帝的怒火将把我们烧得遍体鳞伤。

我们失去了我主上帝对我们的仁爱；我们没有恭请上帝用仁慈的双眼来关注我们。过去没有出现这样的惩罚，而我们也似乎免除了这样的惩罚；可是如今，我们却不断遭受各种各样的惩罚！原因就是：我们背离了万能的上帝我主，我们没有洗净自己身上的罪孽和污浊，我们没有忏悔我们的无法无度，我们没有抛弃我们的陈规陋俗⁶，我们忘记了一场可怕的灾

难正降临在我们的整个国土！

我们避开了小灾小难，但现在却碰上了大灾大难，何况那些使我们受苦受难的邪恶者还没有停止作恶。嫉恨在日积月累，愤恨已积满胸腔。往日那些颂词赞歌依然在蒙蔽我们的心智，我们的心中仍然留有对朋友的仇恨；对财富的贪婪使我们沦为财富的奴隶，贪婪之心使我们既不怜悯孤儿寡母，也不懂得人之常情。像野兽渴望饱餐其他动物的尸骨一样，我们也在渴望并且不停地渴求得到财富；哪怕打家劫舍，杀人放火，也要把那些带泪的钱财和血染的财宝收刮进自己的囊中。野兽吃饱了还会知足，但我们却总不知足，总是贪得无厌，我们总是见利忘义，得寸进尺。

正义之财如果取之有道，上帝不会对我们发怒。先知有言：我主从天庭俯视着大地，他会看到，所有偏离上主指引的人，总会有人认知他，总会有人求告于他，总会有人归向于他。但是，所有无法无天、丧尽天良、干尽坏事的人会认知上帝吗？那些凶恶之徒不是还在屠杀我国人民吗？

使徒保罗一再大声地说：“弟兄们，不要作恶，不要干坏事。因为那些放高利贷的人，打家劫舍拦路抢劫的人，同那些偶像崇拜者⁷一起，都会受到谴责，受到审判。”上帝对摩西也说过：“如果你对孤儿寡母欺凌肆虐，他们会向我哭诉，我会听见他们的哀号，我会大发雷霆，怒火中烧，我会用宝剑把作恶者杀死。”

今天，上主和圣保罗说的话在我们身上应验了：难道我们不是被刀劈斧砍而倒下了吗？难道仅只是一次两次吗？请你们认真地想一想《圣经》中所写的，那是天父自己教导我们的伟大圣训：他教导我们要相互友爱，教导我们对任何人要有仁爱之心，要爱自己的亲人如同爱自己一样，要永远保持身体洁净，不要被那些不洁之物所玷污。如果你受到玷污和玷污他人，那你就用忏悔去洗净它们，你们既不要高傲⁸，更不要以恶报恶。我主上帝的憎恶之心是这样的：他深恶痛绝作恶者的罪恶行径。但我们会怎样说呢：“我们的天父啊，请你把我们自己没有清除的罪孽留给我们吧”？

《圣经》上说：“以德报德，以怨报怨”⁹，我主上帝将这样来审断你们¹⁰。

感谢万能的主啊！阿们！¹¹

附注

1 指《俄国文学与宗教》（西安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1995 年出版，本文下称“该书”）。

2 笔者主要参考了不同时期俄苏文学史家的论著。此外，笔者还参考了我国和俄国出版的其他俄国文学史书籍材料，查阅了有关俄国宗教方面的材料，如《正教词典》（《Православный словарь》），《正教历》（Православный календарь на 1995, 1997, 1998 гг.）等。有些材料，我们只知其名称（如 E.B. 别土霍夫著的《Серпион Владимирский, русский проповедник XIII века》（1888 年在彼得堡出版）以及古济院士 1952 年撰写的论文《Где и когда протекала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Серпиона Владимирского?》等等）。

3 本文引用的英语词 genre 在《英华大词典》中注释为“1.（文艺作品的）类型，（诗、剧、小说、散文的）体裁”（第 627 页）。俄语外来词 жанр [（文学艺术作品的）种类、体裁] 与英语词 genre 同源。

4 文中的“一场邪恶的大火”是指 1608 年波兰—立陶宛军队攻占莫斯科时纵火焚烧全城。

5 本译文根据尼康·古济院士的《11—17 世纪古代俄罗斯文学选读》（第六版，俄联邦教育部出版社，莫斯科，1955 年）的文本译出。俄语原文名是《Слово третье Серпиона Владимирского》（第 162），译名是《弗拉基米尔城主教谢拉皮昂的第三次讲话》；此文也名为《Проповедь Серпиона Владимирского》等。在我国出版的关于“俄罗斯文学史”的书文中，很少谈及这类“布道文”；个别出版物中稍有涉及本文俄语名称有人还译为《符拉基米尔城主教谢拉皮昂的说教》或《符拉基米尔城的谢拉皮翁的演说》等。这里的所

谓《讲话》(Слова)——意为在广场上大声宣讲的布道辞。——译者

6 按古济院士的“选读”的说法,是指古代罗斯社会残存的多神教观念和习俗。——译者

7 《圣经·旧约·出埃及记》载,耶和華授命摩西颁布施行的“十诫”中有一诫是“不许制造和敬拜偶像”。在犹太教和后来的基督教的历史上,“偶像崇拜”是一桩“恶事”、“坏事”,而那些偶像崇拜者受到诅咒,遭到“绝罚”。——译者

8 高傲(或者说,骄傲)是人类最原始的罪之一。骄傲曾使天使堕落,也使亚当和夏娃堕落,因此,教会强调要谦卑,要杜绝贪念暴富和占有欲。

9 见 10。

10 本《布道文》的俄语原文是:“В ню же бо, рече, меру мерите, отмерить вы ся.”(见前面注本文出处);而“В ню же бо, рече, меру мерите...”译成“以德报德,以怨报怨”是按《大俄汉词典》的“...мерить в ту же меру (或 тою же мерою)<文语>以德报德,以怨报怨(源出《圣经》)”(第 987 页)译出;但《Словарь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第 6 卷第 857 页上是“Мерить, мерять тою же мерою. Воздавать, платить тем же (евангельское выражение)”。我们按《圣经》“福音”书去查找,在《新约 马太福音》的“山上宝训”(指耶稣上山对群众讲道)读到:“不要评断人,上帝就不审断你们。因为,你们怎样评断人,上帝也要照样审断你们。你们用什么量器来量,上帝也要用同样的量器量给你们”(自 1997 年中国基督教协会印发《圣经》(现代中文译本)《新约》第 8 页)。译者认为,耶稣“登山训众”中的一些说法(如这里引用的)与“训众”的另一一些说法(如“论报复”、“论爱仇敌”等)是有矛盾的。

11 “阿们!”二字是译者加上去的。因为基督教(以及其前的犹太教)的教徒(或教士等)在祈祷或“布道”结束时常用的“结束语”,表示“诚心所愿”。

参考文献

- [1]Гудзий И.К. История древней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M]. Москва: «УЧПЕДГИЗ», 1953.
- [2]Гудзий И.К. Хрестоматия по древней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XI-XVII веков[M]. Москва: «УЧПЕДГИЗ», 1955.
- [3]Истрин В.М.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древне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домосковского периода(XI-XIII вв.)[M]. Москва: Академия, 2003.
- [4]Кусков В.В. История древне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M]. Москва: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1998.
- [5]Лихачёв Д.С.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XI-XVII веков[M]. Москва: Просвещение, 1985.
- [6]辞海·历史分册(中国古代史)[Z].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0.
- [7]古谢伊诺夫 А. 等. 西方伦理学简史(刘献洲等译)[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
- [8]克柳切夫斯基 В.О. 著. 俄国史教程(第一卷,张草纫 浦允南译)[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2.
- [9]乐 峰. 东正教史[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 [10]杨周翰. 十七世纪英国文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5.
- [11]左少兴. 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传的历史评注[J]. 俄罗斯文艺, 2004(4).
- [12]左少兴编译注. 十七世纪俄国文学作品选读(十七世纪俄语——汉语对照).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Bishop Serapion and His Sermons

ZUO Shao-xing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Sermons, or articles of admonition, is a genre of the ancient Russian literature and occupies a special place in the literary history. Sermons which survive the times are not in great numbers, among which those by Serapion are relatively distinguished. His sermons, representing a combination of loving and defending country and religion, carry the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significance of educating and enlightening the believers. The sermon under discussion not only had its effect on the believers of the time but also influenced later generations, especially in the Russian religious circles.

Key words: Bishop Serapion; Sermon (“Speech 3-d”); 13th century

作者简介: 左少兴（1930—），江西永新人，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俄语语言文学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俄语语言文化学，古代俄罗斯文学。

收稿日期: 2014-10-14

[责任编辑: 刘 锐]